



本期关注：新春读思录

编者按 当红灯笼挂于屋檐，当远方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龙年新春，蠢蠢而来。春节假期，有人走亲访友、出门旅游，也有不少人畅游书海，为新的一年积蓄知识能量。《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邀约6位出版人，撰文写下春节期间的阅读与思考，在《出版周刊》的05版和08版予以呈现，以期对更多出版人有所助益。

在内心荒芜时聆听世界凝视彼此

□傅伟中

龙年春节前夕，我从渔村转道深圳，搭高铁赶赴家乡与亲人团聚。一路上，归乡的旅人形色匆匆，车厢里的乡音音调各异，人们早早地与家乡的亲人诉说着离别的衷肠，约着春节的相聚。

好几年没有这样的旅程，我的内心急迫而忐忑，竟有点像去赶赴一场初恋的约会。不知谁曾去过，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叫远方。但不管怎样，时间是一剂良药，总能治愈游子的乡愁。唐代诗人宋之问写过一首《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知道诗中的落寞本非描摹游子的心境，但人们无不例外地读出了离别的愁绪。

我在渔村工作生活，恍然不觉已近6年。对于千里之外的故乡来说，我算是一个漂泊的游子。对于一个时代来说，6年稍纵即逝，但对个人来说，值得记住的事情太多太多。我常常庆幸自己能够与一群志同道合热爱出版的同事一起，从事喜爱的工作。无论是过去刚走上书业的道路，还是现今依然未曾离开半步，我深知自己受惠于时代、前辈和同事的太多，对此，我永远珍藏着感激。

2018年5月初，我来到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时，正值集团成立30周年，而旗下出版机构在香港成立已逾百年。三十而立，灼灼其华；百年基业，更待传承。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我深知集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见面会上我和同事立下宏愿，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一代代人共同理想情怀，爱惜集团的百年品牌和事业基础，以植根内心的自我修养、忠于



职守的契约精神、敬业乐群的职业操守、无需提醒的工作自觉、自我约束的廉洁品格、充满善意的做人准则、合作共事的团队意识、突破自我的创新能力，投入最大的诚意、挚爱和忠诚，为实现集团的发展愿景而努力。

2018年11月中旬，在饶宗颐学术馆，集团首办联合出版大讲坛。当天，基于对文化的情怀、书业的热爱和集团发展的共同关切，同事们各抒己见，而我选择聆听。我在同事们的发言中沉思，在遥远的思绪深处，集团百年来路上一个个身影清晰可见。回望来路，我意识到，那次的集会是我们再次出发的开始。

那次集会，我们体认，“责任感让我们出类拔萃”，我们提出，“致敬传承，创新求变”，一同立下集团“全球视野、世界格局、中国气派、香港特色”的宏愿，践行“中华文化传播者、世界文明融合者、香港社会建设者”社会责任，并把它确立为立足香港、面向世界、深耕文化、奉献社会的不二信条；我

们时刻提醒自己“以文化人、以书立社”，不忘一代代联合出版人打造传世品牌的文化理想；我们一致体认，从过去到现在，到更远的将来，我们将一如既往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立志要建成“以香港为产业中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发展半径，以大中华区为影响力领域，主业突出、品牌优秀、业态先进、产业链完整、核心竞争力强劲的出版传媒领军企业”。我们将共识写入集团“十四五”发展规划，白纸黑字，立此存照，说了就干。

5年间，我们深信，“出版是集团安身立命核心竞争力皇冠上的明珠”，推动“出版主业提振工程”，提出“聚焦出版做出版，跳出出版做出版；聚焦香港做出版，跳出香港做出版”，持续擦亮旗下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品牌，迎来集团新伙伴，35周年“阅·无止境”论坛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城市，积极争取各界支持，推动香港特区政府创设“香港全民阅读日”，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竭力奉献传世好书；我们深信，“书店是城市的文化火炬和文明灯塔”，努力把书店建成“城市会客厅、书店样板间、文化直播室、读者打卡地”，建成图书发行零售连锁体系；我们深信，“改变才是不变的”，加快推动“渠道变革、业态创新、科技驱动、管理升级”，实施品牌驱动，整合经营资源，重构商业模式，启动全面营销，拓展经营边界，在“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上开拓疆土，运营“一本”“知书”等互联网平台及“一本读书会”，积极

探索知识付费及互联网新领域，复刊《美术家》，创办《读书杂志》，拓展西冷学堂、“艺文香港”、香港教育研究院、“橙立方”新媒体矩阵、“一本读书会”、新雅童书馆等新平台，努力建成香港文化、知识服务、信息传播和教育培训新平台和文化阅读新高地。

5年间，我们经历风雨，也迎来彩虹。每逢重整队形的时候，我都发现，一干热爱文化和书业的同事齐聚，目光坚定，相互砥砺。即便是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大家也从未停下脚步。静默中环顾四周，满目都是疾走的身影，我想要感谢几句，却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我体会到，最好的感谢是珍藏心底且永不忘记。

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转角的契机。龙年伊始，大家又聚在一起，在渔村温暖的阳光下，我漫步在这片土地，不知不觉间走过了土瓜湾，穿越了九龙城，路边车马悄然驶过卷起尘埃，躲过后才发现自己还是选择了那条来时的道路。

我固执地认为，多年以后，如若我们依然挚爱着曾经走过的文化苦旅，一定和内心的情结有关。2018年我加入集团时说过，记不清是哪位哲人说的，荣誉是时间的女儿。在此，我想把这句话分享给书业中的同道中人并时时自勉。

因为，在时间将我们的内心磨砺得荒芜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耐心地聆听世界、凝视彼此。

（作者系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

靠船处下篙 大棋局中落子

□匡乐成



春节假期没回老家，难得放松，我读完了张平的长篇小说《换届》和马伯庸的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都是很值得一读的文学作品。

《换届》情节跌宕起伏，敢于直面现实，以当下人们熟悉的现实为背景，生动塑造了当代领导干部群像，其中既有敢担当敢作为的领导干部，也有“躺平”、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少数干部，还有虽有缺点、但关键时刻能舍生取义的基层干部，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时代性。整部作品融进了作家对现实的深刻感悟和美好期待，描写生动真实、真挚感人，张平“人民作家”的称号当之无愧，我由衷敬佩。

《太白金星有点烦》是以《西游记》中唐僧取经为背景的职场小说，其实和《换届》描述的情节有很多相通之处。马伯庸深谙体制内外职场之道，明写仙界、实写人间，情节、角色设计紧凑合理，读者可以一口气读完。书中影射了很多熟悉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作家知识积淀丰厚，写作轻松幽默，娓娓道来，读来兴味盎然。

这两本书都是拜“新华荐书”所赐，使我和好书有了更多相遇的机会。“新华荐书”是在中国出版协会和韬奋基金会指导下，新华出版社联合新华社旗下各大媒体共同发起的社会公益活动，每两个月在全国各出版社推荐基础上评审发布10本好书，目前已发布22期，并开发了“青春书单”“山水阅读书单”等垂直类情景阅读书单，已成为知名荐书品牌和新华社服务全民阅读的重要载体。

我加入出版行业不满3年，还不敢自称为出版人，但切身感受到了出版业的使命与担当、挑战与压力。2024年新华出版社将迎来建社45周年，作为新华社主管主办的中央级综合出版社，如何提高站位、坚守品位、发挥优势？这是我在春节假期集中思考的问题。“在最高峰眺望、从源头处饮水、在靠船处下篙、在大棋局中落子、抓住纲绳撒网”，新华社社长傅华在2024年新华社工作会议上阐述了这5点工作体会，我反复领会，觉得对新华出版社未来发展非常有指导意义。

在最高峰眺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

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引，新华出版社只有切实学深悟透，把握好、运用好这一思想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切实履行好出版社人的职责使命，努力成为主题出版国家队。

从源头处饮水。新华出版社作为新华社直属机构，红色气质、红色血脉与生俱来，只有把“两个确立”的政治共识转化为“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牢记先是“革命人”再是“新闻人”、先是“党的人”再是“新华人”的政治定位，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才能确保新华出版社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赓续红色血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在靠船处下篙。新华出版社是新华社努力建成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紧紧围绕新华社职责定位和优势谋划工作，通过图书出版、融合出版等多种方式，聚焦展现时代优势，聚焦满足人民需要，聚焦服务治国理政，聚焦助力民族复兴，聚焦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靠船下篙、精准发力，才能通过出版更好为新华社履行党中央喉舌、耳目、智库职责服务，通过出版拓展新华社影响力，让新华版图书成为新华社新闻信息产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棋局中落子。新华出版社是新华社主管主办的出版机构，只有强化大局意识、增强整体观念，自觉把出版社工作摆到新华社大棋局中谋划，充分发挥新华社整体的资源优势、渠道优势、品牌优势、人才优势，与新华社紧密协同、经营、管理以及国内分社、海外分社加强有效联动，攥指成拳、形成合力，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才能努力建设“新华社的出版社”和“出版界的新华社”，共同朝着新华社努力建成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构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抓住纲绳撒网。只有聚焦核心、围绕核心、服务核心，以最高的政治责任感和最强的政治使命感用心用情做好主题出版，瞄准改革攻坚的重点环节，调整产品结构，加快融合发展，加强市场营销，发展多元经营，把有效战斗力集中到关键战场上，才能确保各方面工作目标清晰、指向明确、措施有力，做到事半功倍，推动出版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最近几年，出版业市场格局、经营模式、内容生态、发行渠道都在发生剧烈变化，但社会对高品质内容产品的需求并没改变，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给出版业带来的机遇越来越多，出版业本身转型的速度越来越快，让我们对2024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充满了期待。

（作者系新华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这个时代需要出版更多磨脑子的大书

□尹涛

春节重温康德第一批判，大致梳理了一下最近20年来康德著作的汉译出版情况。邓晓芒、杨祖陶、李秋零等译者居功至伟，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方面的贡献巨大。人民出版社从《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开始，陆续推出了《康德三大批判合集》、规模惊人的三大批判单行本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还修订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康德著作全集》和单行的注释本系列；商务印书馆从1931年出版胡二源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后，一直是康德汉译出版重镇，最近这些年推出了《实践理性批判》的新译本和第一批判的两种新译本，还翻译出版了海德格尔的康德三书的两种。另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重新整理的韦卓民翻译的多种康德著作。

作为读者，我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些出版社；从同行角度看它们做这些大书，我非常敬佩。

做出版的人静下心来，就会看到出版更多磨脑子的大书非常必要甚至非常迫切，推广磨脑子的大书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现在就得要跟碎片化阅读抢地盘，和铺天盖地的短视频争时间。归根结底，是要提高这个时代的思维水平，保护和提高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质量。

我心中磨脑子的大书分两种。

篇幅大、难读才算一种，比如《资治通鉴》。司马光说《资治通鉴》成书后，当时只有一个叫王胜



之的人读完一遍，其余人没读几卷就困得不行了。这部书294卷，中华书局点校本正文9612页，根据我自己的阅读体会，每天可以读一两卷，需要坚持半年左右。按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假定高中生可以读，那么从高中到博士毕业，哪儿会有完整的半年时间读呢？有多少学中国史的博士生读完过这部书呢？参加工作后，什么阶段能抽出这半年时间呢？书中涉及的时间跨度也大，看了后面多半忘了前面；仅仅事件、人物两个维度，都不是轻轻松松读一两遍就能够掌握的。

难懂的书算第二种。比如《纯粹理性批判》。有时候想，没有读过这部康德书的人也许更幸福一些，因为没有遭受过那种严厉的智力层面和毅力层面的双重打击。学生时代有个暑假我尝试读蓝公武译本，结果很快翻完了《康德学述》《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传》等，恍恍惚惚，有象有物的感觉。然后我正襟危坐翻开了原著，

但很多天过去了，还停留在第一版序言。不断从头开始，折腾了很多次，我还是很难翻页。其间打瞌睡、头晕脑胀、迷茫走神、思维短路，各种阅读障碍都出来了。就是那句老话，每一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却不知道在说什么。一个句子读了上半句好不容易抓住一鳞半爪，以为下半句会往某个方向去，但下半句没有一次往我以为的那个方向去。最后收获就是忍耐力的强度练习，几乎一直练到了心斋忘忘的境界。

但是换一个方向看，花很多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读完了三大批判这一类磨脑子的大书，可能获得一种很难替代的幸福。不说这些只能归于个人体验的幸福，也不用去比较读不读的学问高低，最低限度，读过的人脑子里经历了残酷的磨炼，就像参加过阅读的“世界大战”，一般难度、一般篇幅的书，读起来肯定要轻松很多。

最近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一些和碎片化阅读方向相反的令人欣喜的情况，认认真真读大书已不是稀罕的事情。中学里早就要求整本阅读《红楼梦》；高校里针对经典的专书讲座已经蔚然成风，像武汉大学《精神现象学》课程，竟然花了9个学期逐字逐句讲完。前一段看到网上有人严肃地说读完了全7册的《追忆似水年华》，有上千人跟一位年轻老师一起读整本的《左传》好几年了，网上还有人带领大家一起开读《资治通鉴》。

这些经典著作，基本上都是磨脑子的大书。这些大书到底有

多少人在读，能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红迷”不少，但是自称读不进去的人也很多。有些大书是不是根本不可能走向大众？劝人读磨脑子的大书是不是一个好为师而影响人自由选择的冲动？劝出版社磨脑子的大书是不是一个迂阔误事的建议？

查了一下人民出版社出版《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杨祖陶译本平装本的印数，从2017年第2版到2022年12月第9次印刷累计105000册。加上这本书的第1版、各版的精装本和《三大批判合集》精装本，应该是20万册以上的销量了（从1版1印开始，我买过每一种装帧的本子，累计贡献了10本以上）。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康德著作全集》，2021年就已经第6次印刷了。这就是康德这些磨脑子的书在今天中国的出版情况。

衡量一个国家文化水平高低，康德的发行量也许可以做一个参考。人民出版社的这20万册，只是过去20年来新译本中的一个。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现在提倡读哲学原著，以我的一点体会，康德书正是通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尤其是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的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的桥梁。

说到底，读书是个人的事，深度的阅读是非常孤独的。但阅读又特别需要交流和共鸣，推荐好书甚至需要大声呼喊。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出版更多磨脑子的大书。

（作者系中华书局总编辑）

